

# 隐性文化传统的影响力

——以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为例

► 韩 笑

“标出性”的研究,在语言学中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赵毅衡借用这个概念用以说明文化符号学中一些有着相似特点的文化现象。他指出:“标出性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处于文化的动力性演变过程之中。在艺术中,标出性起的作用更为复杂,但是可以为理解现代艺术美学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在语言学中,标出性被定义为“两个对立项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具有的特别品质”,而标出项的两个显著的特征为:标出项总是比未标出项组成复杂,对立的两个语言现象之间,不对称是普遍的。这个概念对应在文化研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在文化研究中,我们无法采用语言学相对科学的实证性方法,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在千头万绪的文化现象中,存在很多显著的二元对立情况,这些二元对立的现像又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文化范畴的二元对立之间,有大量非此非彼的情景靠非标出项表达来表达自身”。在文化的二元对立中,亚文化就是主流文化的标出项,对于主流文化,它就具有“标出性”。在此,笔者借用赵毅衡在阐述这一问题时使用的几个概念,即“把标出项称为异项,非标出的称为正项,非正非异的称为中项”。下面就具体来考察选取的个案中所体现出的“标出性”和它发展变化的特征。

嘉峪关魏晋墓位于嘉峪关市东北20公里处的新城乡戈壁滩上,始掘于1972年。在嘉峪关以东至酒泉市以西20公里的范围内,共有1400多座魏晋时期(公元220年—419年)的地下壁画砖墓群,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可以从中看出,嘉峪关魏晋墓的墓室壁画与其他艺术作品相比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时代背景的特殊性。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政权交替频繁的时期,而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也使这时期的文化氛围相对自由。频繁的战

争带来人口的大量迁徙导致魏晋成为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在河西地区,大量中原人口的迁入使少数民族发生着缓慢的汉化。除此之外,由于河西地区多个民族长期杂居的历史因素,该地区人民除汉化之外,也有一定程度上的羌化、胡化。

第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多民族杂居是河西地区的民族特性。由于河西走廊位于沙漠边缘的戈壁滩,历史上当地少数民族主要以游牧作为生产方式,但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半游牧半农耕的生产方式。据《汉书·地理志》载:“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上述两个特征使嘉峪关魏晋墓与同一时期的辽阳魏晋墓区分开来。

第三,墓室壁画相对于其他壁画的特殊性。墓室壁画最突出的特殊性为:它在创作完成后就深埋于地下,与社会断开了联系,对后世失去了直接影响。这个特征使它与敦煌莫高窟的石窟壁画区别开来。

基于嘉峪关魏晋墓壁画自身的特性,我们把当时的社会文化做一个横截面,由此来考察“标出项”(异项)的变化。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化是汉民族表征的农耕文化(正项),亚文化则是少数民族表征的游牧文化(异项),而河西走廊所表征的是这个社会横截面的“中项”。

在所有形成二元对立的文化现象中,“文化标出问题”都落在正项/异项/中项三个范畴之间的动力性关系中,任何文化范畴的两元对立,如正常/异常、智/愚,由于中项的介入,都处于三元的动力性变化之中。”在大多数二元对立中,绝对正项和绝对异项都是极少数,大多是介于其中的中项。因此,中项靠向哪边决定了在一个文化现象中正项和异项是继续

维持现状还是发生关系的逆转。我们的个案中,多民族杂居的特征是中项,如果它认同汉民族文化,该文化就仍然是社会主流文化;如果中项认同少数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就会因争取到中项而逐渐变成社会文化的正项,先前的正项自动转换为异项。

魏晋时代的甘肃河西墓室壁画多以表现现实生活为主,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其主要特征有两点:图画表现方式是中国画传统的以线造型的笔法。魏晋墓的壁画,都是先以线条勾勒出人物、动物和器物的主要造型,再填以土红、朱砂、赭石、黄色等,形成了热烈明快的色调。线条较有力度,能体现出所画事物的特性,人、动物、器物以及建筑的造型都已经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尚未达到传神的境界)。构图上“沿用了汉画构图中常见的横分割二层或多层分层排列,将不同时间、空间的事物,用装饰性很强的平视形式构图组织在一起”。这些构图的基本笔法和布局,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魏晋墓的壁画相比起同一时期的绘画来说,仍体现出技巧上的落后性。多个民族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首先是多民族的杂居,然后是经济生产方式的融合,这一过程体现出较低级的生产方式向较高级的生产方式靠近的特征。最后是文化上的融合,多个民族在共同生活和生产的基础上建构起表现于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才算是真正的民族融合。就河西走廊的民族融合来看,当地人除了被“汉化”以外,也有部分的被羌化和胡化。这个特征反映在魏晋墓的壁画上,具体表现为:首先,在绘画技巧上落后于同时期汉民族的作品。其次,壁画的内容反映出河西走廊当时并没有完全被汉化,他们狩猎和烤肉的图画,表现出半农耕半游牧的生活状态。再次,文化的融合体现出了互相排斥、互相渗透,最后达到统一的特征。河西文化作为当时文化的“中项”,兼有了“正项”和“异项”的特点,呈现出逐渐向正项靠拢的趋势。

问题在于,既然“中项”兼有正项和异项的特征,为什么它是导向了正项而不是异项?这其间有众多因素的影响,笔者认为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项对于中项的包容,这种包容是通过降低正项的标准来实现的。《礼记·王制篇》中“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的说法是汉民族朴素的民族观,而在《孟子·滕文公》中提出了“用夏变夷”,“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些说明了汉民族强烈的文化自信和对其他文化的包容。二是,在这对正项和异项的对立关系中,少数民

族的文化作为异项,其自身的包容性和吸纳性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们是无法使中项偏向自己。

在此特殊的环境中,汉文化的包容和影响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笔者认为这属于显性文化传统和隐性文化传统的影响力问题。所谓显性文化传统,就是“一部分以文本方式体现出来的文本文化传统,一部分以制度方式体现出来的制度文化传统”。而隐性文化传统则是指“一部分以观念形态体现出来的文化观念,以及作为文化传统承载物的某些语言表述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这个个案中,显性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势弱的,主要因为地域偏远导致了传统思想的控制力减弱,而文本和制度方面的影响力在当地也只能表现势弱。但是,我们明显地可以从壁画中看到汉文化的强大渗透力,在此起到重要影响作用的是隐性的文化传统。首先,当汉族大量迁入少数民族地区并和他们共同生活时,语言的统一也是一个必然经历的阶段,当地的少数民族在逐渐学说汉语的时候就已经不自觉地开始接受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了。其次,迁徙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会不自觉地将其民族的文化思想理念传达给少数民族的人们。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渗透到当地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中,使得他们不自觉地开始接受汉民族文化,从而不断偏向“正项”。

通过对嘉峪关魏晋墓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一个美学现象背后所潜在的文化现象中,正项对中项的影响力实际上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力。即使在显性文化传统呈现出势弱的情况下,中项也会在隐性文化传统的强大包容力下不断趋向主流。

#### 【参考文献】

- [1]陈玉屏. 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融合中的几个问题[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3 (1).
- [2]赫俊红. 中国早期绘画题材和构图的变化[J]. 中原文物, 1999 (2).
- [3]夏于全. 四库全书精华史部[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6.
- [4]张双志. 文化的自身认同——传统华夷之辨的文化解读[J]. 天府新论, 2002 (2).
- [5]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10.

(作者简介 韩笑, 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